

■ 探微考据

从河南永城芒砀山出土汉代铜钟铭文看汉代的刑律

郑清森



图2

图1

永城芒砀山位于河南省永城市东北三十余公里的芒山镇，这里为西汉梁国诸侯王陵墓所在地。西汉梁王墓地分布范围约14余平方公里，使用时间自汉景帝时期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经考古调查，西汉梁王陵墓主要分布在芒砀群山的保安山、李山头、夫子山、铁角山、南山、黄土山、偃山、窑山等八座山头上，每座山头上均埋葬有两座大型陵墓，南北并列，墓主人分别为梁王及其王后，一般情况下王墓在南，后墓在北，充分体现了西汉时期夫妇并穴埋葬的诸侯王埋葬制度。

南山一号汉墓位于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芒砀群山的南山山顶南侧，墓上堆有十余米厚的封土。该墓早年曾遭多次盗掘。这是一座横穴式崖洞墓，墓道朝东，由墓道、墓门、斜坡甬道、主室以及主室周围六个侧室组成，墓道和斜坡甬道内用塞石封堵。根据南山一号汉墓所处位置以及墓葬规模、形制结构等分析，应为一座西汉时期梁国诸侯王陵墓，墓主人为西汉时期某一位梁王。1993年7月，商丘地区劳改石料场在南山一号汉墓墓口东南57米的南山山坡开山采石时，发现一座陪葬器物坑，编为南山一号汉墓1号陪葬坑。这是一座长方形竖穴石坑，露天开凿于山体岩石上，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坑底和坑壁未经修整，凿制粗糙。坑口东西长4.415米，南北宽2米，坑底东西长3.85—3.9米，南北宽2米，坑深1.2—1.7米。陪葬坑内出土铜钟1件、铜壶1件、五铢钱2枚和刻有“二月口”文字的方形石条1块。2枚五铢钱形制相同，阔穿，窄外郭，五字交叉两笔稍有弧度，铤字金字旁模糊不清，朱字上部笔画方折，与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Ⅱ型五铢钱相同，应属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铸造的上林三官五铢钱。南山一号汉墓1号陪葬坑出土的铜钟与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铜钟（M1:4108）形制相同，大小也基本相近。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墓主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卒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二月。根据南山一号汉墓1号陪葬坑内出土五铢钱的钱文字体写法以及铜钟、铜壶的形制，推测南山一号汉墓1号陪葬坑的埋藏时代约在西汉中期，即汉武帝中期或稍后。

陪葬坑内出土文物以铜钟最具有历史研究价值。铜钟小口微侈，束颈，鼓腹，平底，圈足，上腹部左右两侧各有一辅首衔环。口沿、肩部、腹部以及下腹部各有一周突起的宽带状纹，肩部、腹部以及下腹部宽带状纹中部均有一周突棱（图1）。肩部和腹部宽带状纹之间刻有铭文九字，铭文内容为“上御钟常从盗者弃市”（图2），横行竖写一行，字体呈西汉早期隶书特点。铜钟口径17厘米，圈足径21厘米，通高45.5厘米。南山一号汉墓1号陪葬坑的埋藏时代约在西汉中期，所以陪葬坑内出土铜钟的铸造年代应早于陪葬坑的埋藏时代。铜钟腹部有旧时修补的痕迹数处，说明铜钟在埋入陪葬坑之前应有较长的使用时间并出现多处破损，笔者推测该铜钟的铸造年代应远远早于汉武帝中期，可能早至西汉景帝时期。

铜钟肩部和腹部之间刻有“上御钟常从盗者弃市”铭文九字。铭文“上”字，是对封建社会皇帝的称谓，在《史记》《汉书》等汉代史籍中常见。例如，《汉书·高帝纪》云：“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文中的“上”，即指汉高帝刘邦。《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竊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上述中所云“上”，指汉景帝刘启。

铜钟铭文“御”字，古时有多种含义，其中有两种含义与铜钟铭文内容相关，一凡是皇帝使用的器物或者与皇帝有关的事物往往要冠以御字；二是指祭祀宗庙的服御物。《春秋公羊传·桓公十四年》云：“御康者何？梁盛委之所藏也。”何休注：“黍稷曰梁，在器曰盛，委积也。御者，谓御用于宗庙。”因此，南山一号汉墓1号陪葬坑出土铜钟应为封建皇帝使用的御用器物或者祭祀宗庙的服御物。

铭文“钟”字，指该青铜器物的名称。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容器，用来盛酒或称量粟米粮食。《春秋左传·昭公三年》云：“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战国时期，常以钟作为粮食的计量单位。《孟子·公孙丑下》云：“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庄子·人间世》曰：“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陈鼓应引司马彪注：“六斛四斗为一钟。”汉钟大多数为青铜质地，一般出土于帝王或高级贵族的墓内及陪葬坑中，传世的南陵钟、周阳侯钟和考古出土的阳信家钟等汉钟均为青铜制成。

铭文“常从”即“尚从”，“常”与“尚”均为禅母阳部字，古时同音，可相互通用。《汉书·惠帝纪》云：“宦官尚食比郎中。”唐代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尚，主也。”唐代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古代主管帝王的事务和御用物品称为“尚”，所以“常从”应指封建帝王身边的侍从官员，隶属于汉代少府，常随帝王出行，并掌管帝王的事务和需要的御用物品。

铭文“盗者”，指盗窃御用物品或者宗庙服御物的人。铭文“弃市”，是汉代时期死刑的一种，即在古代城市繁华闹市处对犯罪人员施以死刑，并将死者尸体弃置于街头示众。《释名·释丧制》云：“市死曰弃市。市，众所聚，言与众人共弃之也。”汉代对处以“弃市”的刑罚有明确的规定。《汉书·刑法志》记载：“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答三百；当斩左趾者，答五百；当斩右趾，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答罪者，皆弃市。”汉代对盗窃宗庙服御物的人，也以“弃市”刑论处。《汉书·张释之传》记载：“其后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文帝怒，上廷尉治。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另外，《汉书》多处记载对犯罪人员施以“弃市”刑罚的例证。《汉书·武帝纪》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娶妾有罪，弃市。”《汉书·宣帝纪》云：“神爵四年十一月，河南太守延年有罪，弃市。”《汉书·宣帝纪》又云：“五凤元年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蚀之。左冯翊延寿有罪，弃市。”

综上所述，铜钟铭文“上御钟常从盗者弃市”应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颁布的一条法律条文，即皇帝的侍从官员如果盗窃皇家御用物品或者宗庙服御物，均属“政治盗窃”，将处以“弃市”的从重处罚。铜钟铭文仅刻九字，虽然内容简单，但却是汉代法律条文的实录，为研究汉代的刑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件铜钟既然为西汉中央政府御用物品，却出土于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国王陵墓地，应是梁孝王刘武在位时期西汉中央政府赏赐给梁国的，后来埋葬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西沙北礁出水的明代花卉纹铜盘及器座

张晨

北礁位于中国南海西沙群岛的最北面，故得名。自20世纪20年代起，长期在此海域捕鱼的潭门港一带渔民在作业时就在多处地点发现过古代的陶瓷器、铜钱、铜锭等文物。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沙群岛考古调查的开展，北礁海域发现了更多的水下遗址，进一步表明了该海域有着丰富的水下文化遗存。

1997年12月初，琼海市潭门港0337号渔船在去往西沙群岛进行捕鱼作业的过程中，在北礁西北海域礁盘外侧，水深约四米处的珊瑚石礁盘上发现并打捞出一批重要文物，包括陶器、瓷器、铜器、石器以及一万多枚铜钱等。这批文物打捞出水后即被海南省博物馆征集入藏，其中就包括几件纹饰精美的明代花卉纹铜盘及素面铜器座。

金属器物因质地相对坚硬，在海水中不易被海浪冲击拍打破碎，故大都保存较好。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1997年北礁出水明代铜盘按质地可分紫铜和青铜两种，刚打捞出水时铜器周身遍布珊瑚胶结，入藏后经过清理和脱盐，才发现铜盘与器座的大小统一，可以组合使用。具体器形如下：

明代花鸟纹铜盘（图1）紫铜质，较大，完整，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内底篆刻缠枝花鸟纹。口径30.4厘米，底径21.4厘米，高5.2厘米，重511克。

明代花鸟纹铜盘（图2）紫铜质，中型，完整，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内底篆刻缠枝花鸟纹。口径23.9厘米，底径16.8厘米，高3.7厘米，重284克。

明代花卉纹铜盘（图3）紫铜质，小型，完整，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盘内底篆刻缠枝花卉纹。口径17.2厘米，底径11.9厘米，高2.7厘米，重132克。

与这些铜盘一起出水的还有配套铜器座，质地均为紫铜。

明代铜器座（图4）较大，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口径23厘米，底径24.8厘米，高13厘米，重370克。器形为上口小、下口大，中部呈亚腰形，内空，器表均为素面。

明代铜器座（图5）中型，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口径18.2厘米，底径20厘米，高10.2厘米，重244克。器形为上口小、下口大，中部呈亚腰形，内空，器表均为素面。

明代铜器座（图6）小型，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口径12.5厘米，底径14厘米，高6.9厘米，重107克。器形为上口小、下口大，中部呈亚腰形，内空，器表均为素面。

我国南海水域的古代海上贸易，兴于宋，经由元至明清不衰。由于这些铜盘和器座出水的沉船遗址未经考古发掘，也没有明确纪年，只能通过伴随出水的其他金属质物一起界定沉没的年代。

北礁的礁盘边缘一带，海水平潮时水深2—3米，1997年南海渔民在发现铜盘及器座的礁盘东北角外侧还发现了1万多枚明代铜钱。这些钱币多是全新的未流通使用过的新币，成串码放整齐，还有一些铜钱表面附着珊瑚。胶结在珊瑚石间的成串铜钱钱孔中残留着一些当时穿钱的细绳。经对这批出水铜钱进行初步整理、辨认及分类统计后，确认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洪武通宝和明成祖朱棣时期永乐通宝占总数七成以上，且并没有比其时代更晚的钱币，所以推测北礁礁盘上沉没的这艘船年代不早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这艘船装载着大量明代初期铜钱，还有部分陶瓷器、金属器、石器、石器等货物，从西沙群岛经过时不幸触礁沉没。

由于明朝官府严禁民间将铜料销往海外，普通商船在进行对外贸易经济活动时一般只能携带市场上流通的旧币，不可能是大量全新的明代钱币。由此看来，能装运大量全新货币的船舶很可能是朝廷所委派的官船。虽未经正式考古发掘，但该沉船遗址从年代、航线、规模、性质等方面的信息与同时期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实可相互映照，而船上少量的外销明代铜盘、铜器座也证实了明代初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物品中，除了大宗的丝绸、陶瓷器外，金属质器物也是重要部分。

我国铜器制作历史悠久，而金属质器和铜钱因质地坚硬，不易完全腐蚀，在浩瀚海洋下的古代沉船遗址中常有发现。如韩国新安沉船出水铜钱达28吨之多，“南海1号”出水铜钱17000余枚，“南澳1号”也出水大量铜钱等；在对南宋时期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的打捞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铁制单体及小块铜类金属沉积物。而在西沙群岛北礁附近，也曾打捞出数量众多的盘、器座、钵、杯、锁、弓箭及铜锭等铜器，其中便包括现藏于海南省博物馆的此批质地精良的明代铜盘及铜器座。

这种形制的花鸟纹铜盘及素面器座在国内同时期少有发现，关于如何使用的记载也很少，但在东南亚一带国家有类似的银质器物及底座，当地人常常用作餐具，由此推断这批明代铜盘及器座应为我国销往东南亚的外销产品。

中国先民们开发南海诸岛、进行海外贸易的过程持续数百年，出水的历代陶器、瓷器、铜器、石器等各类文物和南海岛礁上丰富的历史遗存不胜枚举。这批出水于西沙群岛北礁礁盘的明代花鸟纹铜盘、铜器座出自明代我国沿海地区工匠之手，再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外国。这些宝贵的实物资料不仅是中外外贸贸易的见证，还映照了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繁盛，更是古代中国在南海诸岛活动的重要佐证。



图1



图2



图3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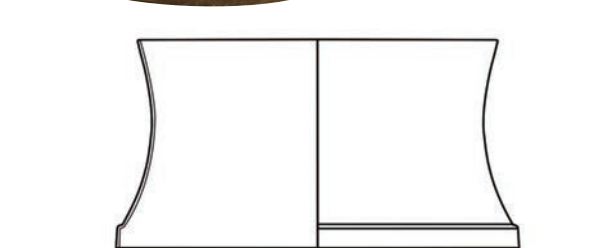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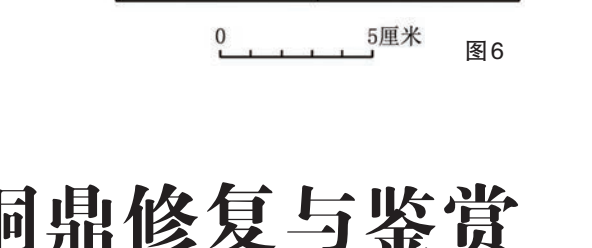


图6

精工奇技藏于器：三件战国青铜鼎修复与鉴赏

罗荣斌



图1-1



图1-2



图2-1



图2-2



图3-1



图3-2

中国青铜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有着不同的风格表现，其形制、纹饰等可谓蔚为大观。青铜鼎作为青铜器中耀眼的瑰宝，是政治和权力的象征，是古代社会“别上下，明贵贱”的重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器型和纹饰以及装饰工艺上均出现了新变化，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大放异彩。

济源市博物馆藏三件战国时期的青铜鼎，由于残缺破损比较严重，已无法看出其原貌，故委托新乡市博物馆进行保护修复。文章以这三件战国青铜鼎为对象进行简要介绍，展现文物修复过程、修复前后的对比，揭开文物保护修复的神秘“面纱”。

修复前战国青铜鼎（图1-1）器物盖面及腹部迸裂、破碎、残缺、扭曲变形。鼎盖从上部隆起破碎成三部分，腹部有破洞和裂缝。鼎底裂口断裂变形上翘，残存鼎足近椭圆形。另一耳从耳根处整体折断，其中一足从足根处折断且下半部分缺失。表面有层状堆积，器物通体锈蚀，两耳多处粉状锈，鼎身部分严重矿化。

修复过程：采用金相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红外光谱仪对这组青铜器的金相组织、制作工艺、病害及其机理等进行分析，鉴别器物表面污染物、锈蚀物成分及结构。将残鼎放入去离子水浸渍脱盐，用软毛刷、木刻刀清除表面附着污垢。采用机械方法清除表面硬结物和有害锈。根据残鼎外形特点及残片形状，利用矫正器具和自制工具对残鼎进行矫正，对残缺部位进行补全、焊接（粘接）、雕刻纹饰进行补配。之后做旧、封护。

修复后蟠龙纹青铜鼎（图1-2）高41.2厘米，口径36.1厘米，重10.4千克。腹壁圆曲向底部内收，腹部较深。有盖，盖面上隆，中央铸圆形镂空捉手，盖面饰两道宽弘纹分为三区，三区饰蟠龙纹。器身合口、圆唇、平底，口沿下对称附一对微向外撇的长方

形曲耳，布满蟠龙纹。鼎身中部以陶纹纹隔，上下饰蟠龙纹。鼎身腹下足与足之间饰有四处蝉纹。短粗蹄足，足中部有二次结合铸造痕迹，用铸接技术浇注完成。

这件青铜鼎出土于济源市邵原镇邵原村周商大墓，该座大墓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品种丰富、纹饰精细、造型优美，根据随葬器物的组合、鼎内残留的羊、鸡等兽骨和墓葬中出土大量兵器等情况，推测墓主人应为男性，生前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贵族，可能是一位指挥军队作战的将军。根据鼎的使用制度和目的不同，可将鼎分为饗鼎、升鼎、羞鼎三大类。在周代，用于炊具的鼎为饗鼎，贵族在祭祀或宴飨等活动中用来煮肉食。此鼎在发掘出土时盛有兽骨，应为用来盛放或者用来煮熟熟的炊器，即饗鼎。

修复前战国青铜鼎（图2-1）鼎盖上有长20厘米裂缝，底部有长7厘米裂缝，两耳从耳根处残缺，三足残缺。下腹部有2.6×1.2厘米破洞，盖有14×3.5厘米的破口，破口周围扭曲变形，一圆钮残缺，部分锈蚀。

修复过程：清除残鼎表面硬结物、疏松的腐蚀产物，部分锈层采用化学去锈，对残鼎盖变形处进行矫正和残缺部位补配、焊接。三足缺失部分采用石膏和硅橡胶翻模法，用锡浇铸完成缺失部分补配。采用矿物颜料进行做旧，使用3%的B72丙酮溶液进行封护。

修复后变形交龙纹青铜鼎（图2-2）战国早期。高32.4厘米，最大口径37.7厘米，最小口径32.8厘米，腹径39厘米。此鼎为半球形腹，腹壁圆曲内收。有盖，鼎盖略隆起，上饰三环形钮。子母口，口下一对附耳外侈，矮粗蹄足。盖面纹饰由三环钮隔开，分内外两组，饰有变形双夔式交龙纹。腹部有一圈箍线将其分为上下两层，各饰一周变形双夔式交龙纹。

从该鼎双夔式交龙纹组合判断，这种纹饰是采用模印的方法连续压在外范上，以每一个印为一个图像单元重复出现构成带状样式，便于一模多用。这样的制作工艺是以蟠龙纹的出现为标志的，可以说蟠龙纹的出现是青铜器制作工艺的一个重要变革，打破了商周时期比较盛行的轴对称纹饰布局，在青铜器纹饰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修复前战国青铜鼎（图3-1）鼎盖上一圆钮缺失，另一圆钮带盖体残缺，下面形成长方形空洞，口沿处有两处缺口，底部有三处孔洞。表面有硬结物，通体锈蚀，口沿处部分矿化。

修复过程：用去离子水清洗鼎表面污垢，对鼎盖残缺部位采用铜皮画形剪裁后依型锤打，以适应缺失部位的形状进行补全，对缺失的圆钮补配、焊接，完成做旧、封护。

修复后变形交龙纹青铜鼎（图3-2）战国早期。高30.4厘米，口径24.8厘米，腹径27.5厘米。根据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中对鼎的分型定式判断，该鼎属于盆鼎。器身似深腹盆，圆底，腹部圆曲，腹部弦纹一周，口微敛，附耳外侈，细长蹄足，耳足分布为五点式。有盖，盖隆起，与器合成扁圆形。盖与腹部饰交龙纹。

交龙纹是由两条以上龙的躯干相互交缠、盘旋的纹饰，春秋战国时期较为流行，在青铜器纹饰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交龙纹有单体连接式，龙的躯干有规律地朝着一个方向弯曲，每条龙的躯干都是连接的；有的则是多条龙交缠一起，形成双夔式、三夔式、四夔式和多夔式。变形交龙纹属于交龙纹一类，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并不多见。带盖鼎多出现在春秋中期以后，流行于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